

巴斯商人對孟買和香港發展的貢獻

薩克塞娜*

許多巴斯商人在18-19世紀從事印中貿易，他們從中所賺取的豐厚利潤對孟買（Bombay）和香港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巴斯客商的數量之多，到華活動的次數之頻繁，貿易量之大，以及部分客商決定以香港為家的歷史事實，都說明了巴斯客商斂聚了鉅大的財富，甚且還有賺取更多的潛力。從事印中貿易的巴斯商人，大部分來自印度西部，特別是孟買。因此，他們斂聚的財富又轉回孟買，幫助孟買發展商業、工業和造船業。巴斯商人對華貿易不僅促進了孟買的經濟和城市發展，中國的影響也反映在這個日新月異的印度商業之都的社會、文化、政治和知識等領域。在孟買和香港，哪裡有需要慷慨解囊的公益事業，哪裡就有巴斯商人的活躍身影。因此，巴斯商人從事的慈善事業，也就成了一個值得宣揚的重要方面。

孟買的巴斯商人最初祇是給英國公司做擔保，繼而開始和英國人合夥，逐漸打入銀行、保險、房地產等領域，才開始獨立經營並開設棉紡廠。他們對宗教機構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並且創立了旨在推廣教育的慈善信託基金。他們的無私捐贈，造就了數家醫院、醫學院、研究中心和一所藝術建築學院的落成，對推動高等技術教育的崇高事業，實可謂“功不可沒”。巴斯客商也是最早從事商品零售的。他們和英國政府保持着友好關係，活躍在多個政治協會之中。他們不僅參與祇涉及祇教徒的社會文化活動，而且還參加整個孟買市及其家鄉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社會文化活動。

巴斯商人和孟買歐洲公司的合作

19世紀前半葉在華貿易的巴斯客商老前輩，當屬賈姆謝德治·傑治皮（Jamsetjee Jejeebhoy）無疑。他於1799-1807年間數次乘船訪華，通過羅傑·德·法利亞勳爵（Sir Roger de Faria）打入商界，

並和勳爵保持着篤厚的交情。對賈姆謝德治·傑治皮來說，中國是個機遇之國。在1803年6月至1804年12月的第三次訪華期間，他不僅在那裡創辦了公司，而且還在馬德拉斯（Madras）、加爾各答（Calcutta）和南洋各國開設了代辦所。在第四次訪華途中，他與威廉·查顛（William Jardine）邂逅。賈姆謝德治·傑治皮是孟買的主要鴉片供應商，廣州生意做得最為火旺。1816年後，他代理布魯斯暨福塞特公司。^{（1）}除了賈姆謝德治·傑治皮外，其他許多印度商人也同歐洲公司保持關係，並與它們開展貿易。造船大亨賈姆謝德治（Jamsetjee）的兄弟佩斯通治·博曼治·瓦迪亞（Pestonjee Bomanjee Wadia）與布魯斯暨福塞特公司合夥，1789-1816年間在孟買經營。另一位兄弟霍穆斯治（Hormusjee）和福布斯暨史密斯公司關係密切。達迪·納瑟萬治（Dady Nasserwanjee）與東印度公司高級商人亞歷山大·阿達姆遜（Alexander Adamson）合夥經營，後來其子阿爾德瑟·達迪（Ardesir Dady）也加盟其中。霍穆斯治兄弟公司曾經委託登特公司寄售；芒

*薩克塞娜（Shalini Saxena），孟買大學烏爾哈斯納加（Ulhasnagar）附屬單迪柏夫人學院（SMT.C.H.M. College）歷史系主任，高級講師，從教三十餘年；目前正與馬達維·但皮博士（Dr. Madhavi Thampi）合作，從事“中國對孟買歷史的影響”之專題研究；其研究領域為現代印度史和現代中國史，招收博士生及指導他們的研究工作。



孟買銀行（本文插圖均為魯斯湯姆·賈姆謝德吉七世准男爵提供）

車爾治·賈姆謝德治 (Muncherjee Jamstjee) 是波普暨哈密爾頓公司的合夥人。⁽²⁾

銀行業

為了促進商業活動，在華的巴斯客商率先成立了銀行及相關機構，如商會和保險公司。商界領袖達達皮·佩斯通治·瓦迪亞 (Dadabhoj Pestonjee Wadia 由其外祖父佩斯通治·博曼治·瓦迪亞收養) 成為孟買商會的創始人之一，並於 1836 年出任一個委員會的委員。1836 年 12 月，他是孟買銀行臨時籌備委員會中唯一的印度籍委員。他也曾為成立東方銀行之事奔走呼喚，並一度擁有該銀行八分之三的股份。⁽³⁾ 另一位著名巴斯客商伏拉姆吉·科瓦斯吉·巴納吉 (Framji Cowasji Banaji)，人稱西印度萊斯特勳爵，與孟買銀行和商會的淵源極深。科瓦斯治·納納皮·達法 (Cowasjee Nanabhoj Davar) 倡議成立了 1853

年開業的印度招商銀行。該行的早期股份基本為歐洲人和印度人均佔，但絕大部分業主為巴斯商人。第一屆董事會的名額分配得比較均衡，分別由三名英國和兩名巴斯商人構成。⁽⁴⁾

匯豐銀行誕生於 1864 年孟買發生的史無前例的投機狂潮前夕。⁽⁵⁾ 為了給東方貿易和發展籌措資金，香港的許多洋大班共同發起創設匯豐銀行。香港銀行的成立，使“孟買老會所的利益合併到了一個專業公司之下”。⁽⁶⁾ 在臨時委員會的十四名成員中，有三名印度人代表孟買利益。他們是 P. F. 卡馬公司的魯斯托姆治·敦傑蕭 (Rustomjee Dhunjeeshaw)、卡馬治公司的帕朗治·伏拉姆治 (Pallanjee Framjee) 及大衛·薩松父子公司的亞瑟·薩松 (Arthur Sassoon)。作為銀行和諮詢機構，匯豐銀行為中印貿易的融資發揮了卓有成效的作用。由於擁有合法地位，該行還向對華鴉片出口提供資金。孟買的投機狂潮導致許多印度公司倒閉。1866 年 7 月，兩名巴斯董事離開了香港。⁽⁷⁾ 大衛·

薩松公司的大班則繼續留任匯豐銀行董事，祇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除外。

房地產

通過商業活動賺取的財富，被投入到整個孟買的房地產開發當中。克塞特吉·科瓦斯吉（Cursetji Cowasji）在柯拉巴（Colaba）建的“轉讓樓”，後為另一對華貿易商卡塞特吉·法敦吉·帕萊克（Kharsetji Fardunji Parekh）收購。⁽⁸⁾

帕賴爾（Parell）、馬扎岡（Mazagoan）、布里奇·坎迪（Breach Candy）、昆巴拉山（Cumballa Hill）、赤園（Lal Baug）等地的房屋依然見證着當年那股房地產投資熱潮。⁽⁹⁾位於孟買堡壘區繁華路段的現金大廈和巴納治大廈，如今是當年那些對華貿易商後裔的寫字樓。孟買許多住着巴斯人家的聚落，被慈善基金會視為信託財產，雖然位於高尚時髦的住宅社區，但祇收取象徵性的租金。如果說達達皮·佩斯通治·瓦迪亞當時不是孟買島的主人，那麼他至少被認為是半個馬扎岡的業主。他和胞弟芒車爾治在孟買島的不同位置建有大量樓宇，在海岸附近的蘇里（Sewri）也有一大片空地，後來被改作鹽田。對於業主來說，那是一塊財源滾滾的風水寶地，政府也從稅收中獲利良多。⁽¹⁰⁾

船舶業

由於身處商貿前沿，巴斯商人深知擁有船舶的重要性。從事對華貿易的巴斯商人，一般都用巴斯人的船來運貨，但是，運費侵吞了大部分利

潤。為了節省這部分開支，賈姆謝德吉·傑治皮精明決策，購買了一支船隊。⁽¹¹⁾瓦迪亞家族在造船界大名鼎鼎。佩斯通治·博曼治·瓦迪亞及其兄弟霍穆斯治，對孟買造船廠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對航運業的推動，也同樣引人矚目。在對華貿易中經營絲綢和鴉片而獲得大量財富的伏拉姆吉·科瓦斯吉·巴納吉，是當時的大船主。他那位同樣從事對華貿易的兄弟克塞特傑·科瓦斯吉（Cursetje Cowasji），也擁有好幾艘船。巴納吉家族一度曾擁



賈治爵士巴斯慈善會

有多達四十艘遠洋輪船。其他大船主如達迪塞思家族（Dadiseth）、現金家族（Readymoney）和卡馬家族，也都經營造船業務。^{（12）}

阿馬倫度·古哈（Amalendu Guha）認為，孟買造船廠的意義，不僅體現在它們製造船隻的數量多，而且還反映在它們促使印度企業家產生了前瞻性思維方面。克莉絲汀·多賓（Christine Dobbin）寫道：“孟買的造船廠通過技術創新，促使巴斯商人從商業型向工業型心態轉變。”^{（13）}

工業

巴斯商人對造船業的投資，似乎為此後的工業發展鋪平了道路。事實上，造船祇不過是一個工業前奏，巴斯商人後來對棉紡業的投資規模大大地超過了它。其它地方的商人一旦發了財，一般總是置辦地產，但巴斯商人卻立志要把孟買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棉紡中心。

科瓦斯治·納納皮·達法 1851 年創辦的孟買紡織廠，是巴斯商人在這一行業的最初嘗試。^{（14）}此後，棉紡廠在孟買如雨後春筍，遍地湧現，如曼加爾達斯·納舒拜伊（Mangaldas Nathubhai）開設的孟買聯合紡織廠，丁曉·帕迪特爵士（Sir Dinshaw Petit）的馬納克吉·帕迪特織造公司，皇家紡織廠（後改稱丁曉·帕迪特紡織廠），馬扎岡織造公司，維多利亞織造公司，伏拉姆吉·帕迪特織造公司，黃金紡織廠（後改名為博曼治·帕迪特紡織廠），以及博曼傑·瓦迪亞（Bomanji Wadia）開辦的博曼治·霍穆斯治紡織廠。墨萬吉·巴夫納加里（Merwanji Bhavnagari）和帕隆吉·卡帕迪亞（Pallonji Kapadia）設立了新大遠東紡織廠。這些工廠的籌建費，主要來自巴斯企業家自己的資本及親朋好友的集資。

“塔塔（Tata）家族之進軍現代棉紡業，是一個商人在工業化進程中將自己轉變為工業領袖的範例。”^{（15）}在塔塔家族從事棉紡業前，孟買的棉紡廠一直生產家用粗布，或銷往中國市場的低支紗。後來，塔塔家族決定和英國織造商一決雌雄，用當地

生產的棉花織造精紗和細布。^{（16）}斯瓦得什紡織廠就是這一嘗試的先行者，該廠織造的棉紗在中國市場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賈姆謝德吉·納薩爾萬吉·塔塔（Jamsetji Nasarwanji Tata）為著名實業家，號稱“印度工業之父”。他在香港創辦名聞遐邇的塔塔兄弟公司，廣泛經營紡織品業務。他是印度棉紡業先驅，擁有四間棉紡廠。由於賈姆謝德吉在賈姆謝德布爾（Jamshedpur）創辦了塔塔鋼鐵廠，該市遂以其名字命名。印度對華貿易和其它國際貿易的繁榮，歸功於他建設的這一鋼鐵廠及其它大型工廠和水力電廠。

巴斯商人與每項重大經濟活動都有關係，譬如他們購買了著名的印度半島鐵路的股權、創辦了孟買汽船航運公司及巴斯保險協會。^{（17）}通過零售從歐洲和中國進口的商品，巴斯商人還開創了地方商業。比卡吉·貝拉姆治·潘德（Bhikaji Behramjee Pande）就是最先把握商機，並於 1725 年在草場街開設零售店的巴斯商人。

宗教和慈善事業

由於巴斯商人具有樂善好施的優良傳統，加之孟買政府財力薄弱，因此孟買的許多早期建築、道路和設施（其中有些至今依然是孟買的地標），至少是間接地用對華貿易的利潤興建的。被尊為賈治爵士的賈姆謝德吉·傑治皮特別熱心公益事業，前後捐款總計二百五十萬盧比。^{（18）}積極參與促進孟買發展的公益活動，為推行公益和博愛廣施錢財，是其人生哲學。大凡水火和饑荒的災民，都得過其慷慨救濟。賈治爵士的公益活動，為其贏得了開明紳士的美名。他率先推行的廣泛的和各種性質的善舉，為他贏得了數百萬印度人民的感激。^{（19）}

賈治爵士從事的主要公益活動，包括他於 1823-1859 年間擔任的巴斯五老會（*panchayat*）的理事角色。五老會是一個准司法性機構。他篤信祆教，並著有《五老會要義》（*Kholaseh-I-Panchayat*），對教

士的無知進行了無情的鞭撻⁽²⁰⁾，但他卻沒有正統或保守到冥頑不化的地步。

賈治爵士的施捨，惠及拜火寺、臨時居所（*dharma-shalas*）、靜塔（*dakhmas*）及捐贈用品。與其有關的拜火寺遍及蘇拉特（*Surat*）、普尼（*Pune*）和納伐薩利（*Navasari*）。其子還在他的地產上修了一座伽馬迪亞拜火寺。他出資為柯拉巴的居民打了一口井。賈治爵士在普尼的海灘和水廠工程，總共耗費了他十七萬三千零五十盧比，而政府祇出了八萬四千九百九十九盧比。賈治爵士的夫人阿瓦拜（*Avabai*），同樣熱愛孟買，並同樣熱衷於扶貧濟困。⁽²¹⁾她修築了連接孟買島和人口稠密的薩爾塞特島（*Salsette*）的馬希姆（*Mahim*）堤道，整個工程耗資十四萬盧比，全部由賈姆謝德吉夫人捐獻。

其他參與宗教和慈善事業的巴斯商人，包括科瓦斯治·熱罕吉爾·現金（*Cowasjee Jehangir Readymoney*），他一共建造了三十二座提供飲用水

的裝飾性噴泉。⁽²²⁾伏拉姆吉·科瓦斯吉·巴納吉於1832年出資兩萬盧比，清洗並加深了洗衣池。佩斯通治·博曼治·瓦迪亞對慈善事業出手也十分大方。他對社區的最大貢獻，就是為紀念母親哈瑪拜（*Hamabai*）的功德，將石階從喬巴堤（*Chawpatty*）一直鋪到了靜塔。⁽²³⁾商界名流達達治皮·佩斯通治，是另一位熱心公益的公民和慈善家，他重修了貝拉姆大廈、瓦迪港拜火寺、赤園私宅的拜火寺，以及巴生（*Bassein*）的臨時居所。他還為在孟買建造一座新的靜塔捐了款。⁽²⁴⁾

教育及醫療設施

雖然賈姆謝德吉·傑治皮沒有受過任何正規教育，但是他想讓自己的名字和教育普及聯繫起來。⁽²⁵⁾他創立的賈姆謝德吉·傑治皮爵士巴斯慈善會，先後興建了十九所學校，包括兩所女子學校。這些學



賈治爵士醫院

校有八所至今猶存，在賈姆謝德吉·傑治皮爵士巴斯慈善會的管理下，繼續為教育事業做貢獻。在眾多善舉中首屈一指的，是一個為辦一所藝術學校而設的十萬盧比的捐贈基金。在教育事業尚在襁褓階段、學校屈指可數的年代，1857年賈治爵士藝術學校的建立，可謂是功德無量的至善之舉。1878年，該校遷到自己的校園。1958年，政府決定將該校一分為三。今天，賈治爵士藝術學校、賈治爵士建築學院以及賈治爵士商業藝術學院足以證明，這位偉大的先見者當時目光是多麼遠大！為設立俄爾芬斯通(Elphinstone)教授基金，達達皮·佩斯通治·瓦迪亞捐了一千五百盧比。⁽²⁶⁾科瓦斯治·熱罕吉爾·現金為慈善事業捐了大約一百四十萬盧比，其中包括修建孟買大學大會堂的捐贈基金三十萬盧比。⁽²⁷⁾

在平民百姓看病難的時代，賈姆謝德吉·傑治皮於1834年開辦了孟買國民大藥房。在開藥房時，賈治爵士遇到不少困難，因此決定捐資十萬盧比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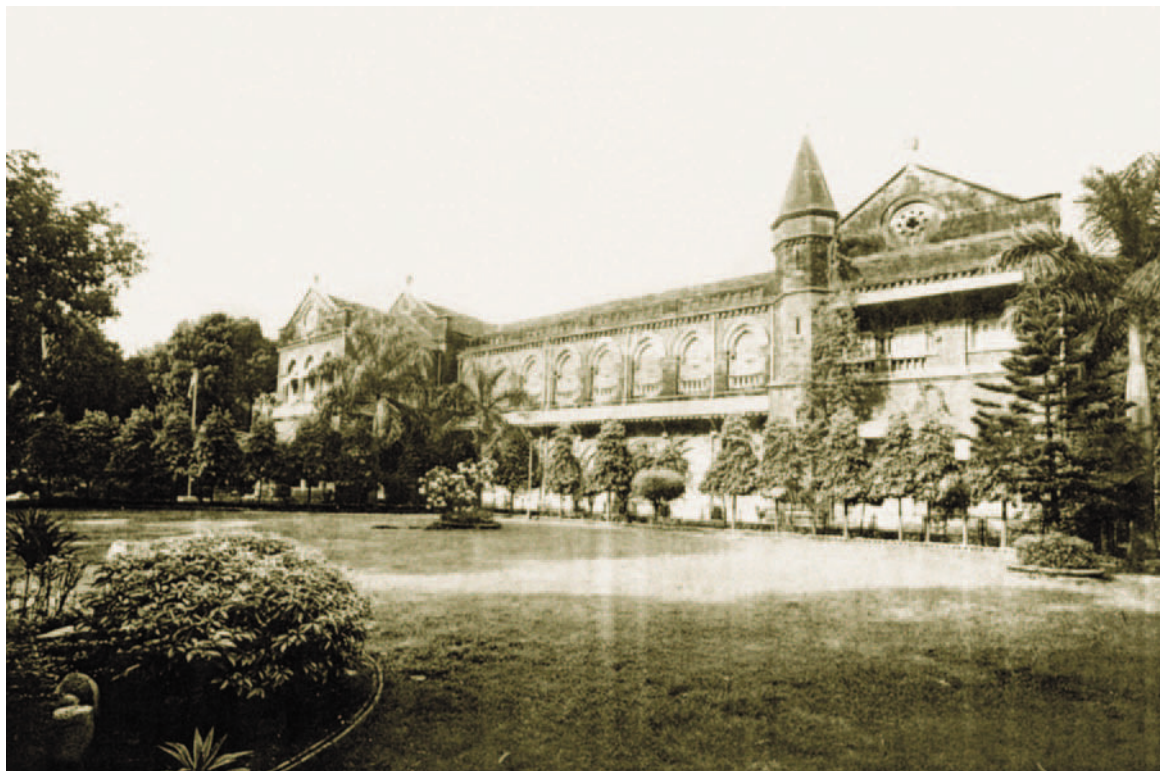
一家醫院。他在另一次捐贈中擴大了數額，後又追加了五萬盧比。賈治爵士醫院於1843年由時任孟買市長的喬治·亞瑟爵士(Sir George Arthur)奠基。1958年，醫院的舊房為一幢八層的新樓取代。今天，賈治爵士醫院仍然是孟買最好的公立醫院之一。印度第一家免費都市敬老院和第一所婦產科醫院，也是由賈治爵士慷慨解囊建成的。⁽²⁸⁾

為紀念對華貿易商 F. D. 帕迪特(F. D. Petit)而建的帕迪特療養院以及 B. D. 帕迪特(B. D. Petit)祔教綜合醫院，現在仍然受到香港巴斯商人的慷慨支持。

曾經在華經商的佩斯通治·霍穆斯吉·卡馬(Pestonjee Hormusji Cama)，建有卡馬醫院。

文化及藝術

2002年10月的兩大盛事，即國家現代藝術畫廊舉辦的“社區照片展”(展出巴斯商人的繪畫、照片



賈治爵士藝術學校

及文物)以及孟買博物館協會主辦的“祇教世界的瑰寶”研討會,將印中文藝領域千絲萬縷的聯繫公之於眾。展出的繪畫、照片及威爾士親王博物館(今查特拉帕迪·石瓦吉博物館)的館藏文物,反映了印中貿易鼎盛時期發展起來的妙趣橫生的文化聯繫。

巴斯商人將中國最富麗的絲織品帶回了印度,紡織業就是他們對印度工藝美術經濟的最大貢獻。20世紀初,華商將精緻的麻布、錦繡和絲綢帶到印度,受到居住在孟買的巴斯富婆們的熱烈追捧。在生活中展示中國關係,是一種地位象徵。⁽²⁹⁾最具特色的巴斯服裝錦緞莎麗(*gara*),是在中國為巴斯老富婆定做的。這些錦緞莎麗全部用手工刺繡,圖案則取自中國神話或社會生活。

巴斯客商也許是在19世紀把錦緞莎麗帶回印度的。巴斯女子對錦緞莎麗十分珍愛,祇在婚禮和新光大典時才穿。中國的錦緞莎麗起初穿起來略顯臃腫,因為它們四邊都有刺繡。刺繡圖案反映了華人的生活景象,如寶塔、神龕、河堤、士兵和僊鶴之類,圖案越精緻,售價也就越高。

有些莎麗上繡有漢字,被認為是繡工的簽名。

錦緞莎麗和“唐綵”(*tanchoi*),最初都是中國工藝品。“唐綵”之得名,源自來自中華(Tan)的巴斯人賀熙(Joshi)的廟(tan堂?)兄弟,因為他們把學會的技術帶回了印度。唐綵在中國刺繡的基礎上,增加了鳥獸、花卉、山川圖案和故事情節,通常伴有明顯的漢文化色彩,如寶塔和華人。許多19世紀的錦緞莎麗,如今都成了珍貴的傳家寶。它們是印中貿易的歷史見證。⁽³⁰⁾

有些巴斯商人的畫像,是客居印度或在華的中國畫家繪製的。在19世紀的中國,特別是廣州,人像繪畫和玻璃繪畫十分流行。最多產、最受歡迎的畫家,名叫林呱(Lamqua)。他在廣州開有畫室,並有一幫徒弟協助。最令人流連忘返的中國畫,是兩幅19世紀30年代繪製的未署名的人物油畫肖像,畫的是伏拉姆吉·佩斯通吉·普阿塔克(Framji Pestonji Puatuck)及其兒子凱庫西如(Kaikhushru),另一幅畫畫的是庫費爾吉·卡特拉克(Kooverji Katrak)。

孫呱(Sunqua)的畫題為“常達皮(Chandabhoy)家的孩子們”。畫中的孩子穿着傳統服裝,還戴着繡花禱帽。

巴斯人用的傢俱,精雕細鏤,極具特色,反映了跨文化(包括漢文化)的聯繫。

拉坦·塔塔爵士(Sir Ratan Tata)的藝術藏品(特別是中國玉器),其中包括許多小巧的鼻煙壺,是無與倫比的。在威爾士親王博物館剪綵開放時,它們是該館最重要的獨一無二的藏品。

其它開拓性工作

賈姆謝德吉·傑治皮爵士的名字,還與許多其它開拓性公益事業和活動有聯繫。⁽³¹⁾1852年,孟買協會——第一個政治協會——成立時,他被推選為該會第一任名譽主席。他熱心贊助新聞和文學,為伏爾東吉·馬孜班吉(Furdoonji Marzbanji)1822年創辦的《孟買新聞報》提供了極大的幫助。他出任《孟買時報》和《商報》(後改名《印度時報》)的管委會委員。賈治爵士還給佩斯通吉·馬內克吉(Pestonji Maneckji)捐款,支持傑姆·傑姆謝德出版社。他也是《孟買信使報》的股東之一。賈治爵士是孟買大學1857年聘任的五名研究員之一。所有巴斯貿易大亨都曾是巴斯五老會的重要成員,英國人還任命了其中幾位為大陪審團成員或治安法官。這些舉措為他們在自己的社區和城市裡發揮重要政治影響提供了保障。因此,對華貿易大亨不僅是有錢人,而且還構成了一個相對狹小卻又十分緊密的精英圈子,主宰着孟買19世紀生活的方方面面。

1842年5月,孟買市長喬治·安德森爵士(Sir George Anderson)將英帝國騎士的稱號和品銜授給了賈姆謝德吉,並於同年12月向他頒發了鑲有許多鑽石的金質勳章。然而,騎士頭銜仍不足以表達對這位開明士紳的嘉許,因此英女王又於1857年5月在她的生日嘉賓名單上將他加封為准男爵。孟買人送給他的最後寶貴榮譽,是在他去世後為他豎立的雕像。這座雕像現仍矗立在孟買的皇家亞洲圖書館。

1859年，賈治爵士的逝世，給人們帶來了無限的悲痛。孟買的學校、工廠、辦公樓和紡織廠一律關閉，並降半旗誌哀。他的追悼儀式不僅在孟買舉行，而且也在沐過其恩澤的古吉拉特邦的其它城鎮舉行，同時還在印度和香港的祆教徒中舉行。即使在今天，在所有祆教的宗教儀式中仍將他尊為偉大的祆教徒。

巴斯商人在香港的作用

在概述了巴斯商人對孟買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所作的貢獻後，讓我們來簡單回顧一下巴斯客商在香港的商業、體育、社會福利、教育發展和社區工作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即便在今天，他們仍在香港積極從事商業和其它領域的活動。誠如我們早先指出的那樣，來自印度次大陸的巴斯客商是最早認識對華貿易重要性的商人。⁽³²⁾他們看到了鴉片貿易蘊含的鉅大利潤，經營或包租快船來運送鴉片牟利。雖然巴斯公司後來經營的業務，與香港的聯繫漸漸超過了和印度的聯繫，但仍有不少商人繼續經營印度商品，如棉紗、金屬、香料、鴉片、寶石、珍珠和絲綢。巴斯客商在貿易領域中一統天下的局面，直到20世紀初華商開始進軍海外市場，才慢慢衰落。

房地產

在英國佔據香港之後，四名巴斯客商立刻從澳門趕赴香港，並在那裡小住了一段時間。敦吉皮·魯通傑·比斯內（Dhunjibhoy Ruttonjee Bisney）、赫爾吉皮·魯斯托姆治（Hirjibhoy Rustomjee）、佩斯通吉·科瓦斯治（Pestonji Cowasji）和伏拉姆吉·賈姆謝德治（Framji Jamsetjee），是1841年6月首批在香港置地的客商。⁽³³⁾他們共買了政府出售的約四十塊地皮，為日後殖民地的繁榮作出了貢獻。隨着局勢的穩定，移居香港的巴斯客商越來越多。

1852年由孟買外出經商的朵拉布治·瑙羅治（Dorabjee Naorojee），是香港最早的巴斯僑民之

一。他銳意進取，因而財源滾滾。他在灣仔建了大型倉庫，經營倉儲業務，從而緩解了令商人們頭痛的對印貿易貨物週轉不便的問題。⁽³⁴⁾他在九龍擁有一些地產，並負責將九龍開發成住宅區。

1884年抵港的霍穆斯治·魯通治（Hormusjee Ruttonjee），投靠了在港經商的親戚。⁽³⁵⁾魯通治家族素以熱心公益、慷慨行善聞名。J. H. 魯通治在九龍開發房地產，並擁有九龍和王宮大酒店的股份。

1858年，霍穆斯治·納夫羅傑·莫迪（Hormusjee Navrojee Mody）初抵香港時，祇是一名低級幫辦。憑着他的勤奮好學和遠見卓識，莫迪在殖民地巴斯客商中的地位迅速上昇，很快就成了其中的佼佼者。⁽³⁶⁾莫迪和保羅·查特勳爵（Sir Paul Chater）合夥經營的公司，一貫以做生意精明幹練聞名，不久便成了譽滿香港和九龍的大型房地產金融家和業主。他們組織的普拉亞填海工程（Praya Reclamation Scheme），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高大巍峨的親王大廈和女王大廈，是他們建造的最宏偉建築。九龍城的中央區，是香港最出名的商業和銀行中心。在九龍還是一片荒蕪時，他對那裡的房地產開發就充滿信心，並投入了重金。在九龍的住宅區開始基本成型時，政府想在莫迪的私地上修建一條公路，他立即將那塊地皮無償贈給政府。為答謝他的厚禮，政府將新修的公路命名為莫迪路。

商業

香港的巴斯客商經營的業務，種類繁多，主要是向印度進出口各類產品。以港為家後，他們開始參與其它各種促進香港經濟繁榮、同時也使自己更加騰達的活動。霍穆斯治·莫迪從鴉片貿易轉向貨幣和股票交易，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成功使他對領導香港銀行和商界充滿信心，同時也為他贏得了尊敬。⁽³⁷⁾在為P. F. 達瓦爾（Daver）和B. P. 卡蘭賈（Karanja）公司服務多年後，霍穆斯治·魯通治於1891年在擺花街（後遷至德已立街）開張了自己的

商店，經銷食品、葡萄酒和烈酒。其子 J. H. 魯通治將生意做得更大，並增加了進出口、代理和房地產業務。他在九龍和王宮大酒店都持有股份。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成功地開了一間釀酒廠。⁽³⁸⁾

在為拍賣商和食品商杜戴爾公司幹了一段時間後，朵拉布治·璦羅治獨立出來，開了一家麵包房，並多年按合同為皇家陸海軍提供軍需給養。⁽³⁹⁾ 1870 年，他先出任一家酒店經理，後來成為香港和九龍多家酒店的業主，包括維多利亞大酒店、愛德華國王大酒店和九龍大酒店。

傑姆謝德吉·塔塔 (Jamshedji Tata) 家族的 D. C. 塔塔，主要經營印度和日本棉紗及各種小件製品。他的經營非常成功。他後來成立的塔塔父子公司，現仍活躍在香港商界。⁽⁴⁰⁾

教育和醫療設施

截止 19 世紀末，香港祇有一間小小的醫學院和女王學院為這個港市的高等教育服務。1907 年醫學院註冊成立時，港督弗萊德里克·路加爵士 (Sir Fredrick Lugard) 倡議創設香港自己的大學。⁽⁴¹⁾ 大學的設立，將有助於中國吸收現代科技知識。然而路加總督的捐款呼籲，起初並沒得到多少人的回應。許多華人對西方的學識仍心存疑慮，而絕大部分歐洲商人則認為，大學是一個毫無必要的奢侈品。霍穆斯治·璦羅治·莫迪為建大學捐輸十五萬港幣，另捐三萬港幣成立一個捐贈基金。這兩筆善款是霍穆斯治獻給香港最高尚、最永恆的厚禮，同時也助長了他的飛黃騰達。他的慷慨贏得了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和廣東總督 (Viceroy of Canton) 的高度評價。英王愛德華七世陛下封他為三等爵士 (Knight Bachelor)，以彰其行。1910 年，在有眾多名流參加的大學奠基禮上，路加港督宣讀了這項敕封。受到莫迪的激勵，許多人當場承諾給大學各系捐款，認捐總額高達一百二十五萬港幣。

最早在香港置地的巴斯客商希爾治皮·魯斯托姆治 (Heerjeebhoy Rustomjee)，把臨海十號地轉

讓給了怡和公司，並答應為修建一所海員醫院捐款一萬二千港幣。⁽⁴²⁾ 但當醫院籌委會試圖取錢時，他們卻發現取不到款，魯斯托姆治顯然忘了將那筆錢轉給怡和公司。然而怡和公司不僅立即承擔了捐款責任，而且還追加了兩萬港幣。醫院原打算以希爾治皮的名字命名，但最終還是起了個海員醫院這樣的俗名，後改稱皇家海軍醫院。此後，希爾治皮·魯斯托姆治家族又對香港的結核病防治協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前海軍醫院改為結核病醫院時，它就以其主要捐贈人的姓，取了一個巴斯名字，魯通治療養院。

其餘

在九龍開始發展工業時，朵拉布治·璦羅治創辦的九龍輪渡公司，為香港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九龍輪渡公司後來發展成了當今的天星輪渡公司。⁽⁴³⁾ 它大大推動了九龍作為住宅區的發展。朵拉布治·璦羅治酷愛花卉，在九龍擁有一座漂亮的花園。他不遺餘力地宣導園藝，鼓勵水果和蔬菜種植。在香港的五十二年生活中，他以謙卑和樸實的方式，為建設這個繁榮昌盛的城市盡了自己的綿薄力量。

以為香港大學慷慨解囊而名揚一方的霍穆斯治·莫迪，擁有聞名遐邇的巴克謝馬廐。他用不同品種的玫瑰給馬匹起名，是跑馬場上的豪客，並用賽馬來款待賓客。這位品格高尚樂善好施的人，不僅為殖民地人民的福利和繁榮工作，而且還時刻不忘其印度教友，常常為接濟孟買的祆教徒慷慨認捐。

1858 年，巴斯客商對發生在廣州的饑荒提供了慷慨無私的賑災援助。他們發放大米，扶貧濟困，各界人士紛紛效尤。⁽⁴⁴⁾

巴斯客商對香港的最早貢獻之一，就是在植物園修建的露天樂臺，1864 年 8 月對公眾開放。樂臺現為植物園一景，綠樹環繞，樸實無華，十分宜人。⁽⁴⁵⁾ 1887 年，為恭賀維多利亞女王統治五十週年，巴斯客商在香港各地興建了五處噴泉。噴泉用鐵枝裝飾，每座耗資一千港幣。十年之後，為慶賀

維多利亞女王統治六十週年，巴斯客商又將它們整飾一新。1911年，有人在立法院就它們的失修問題提出動議。以後，這些噴泉皆蕩然無存了。

巴斯客商和英國人維持着友好關係，並真心實意忠於英國王室。霍穆斯治·莫迪捐資為瑪麗女王陛下鑄的一尊銅像，至今仍聳立在雕像廣場。1887年，為慶賀女王統治五十週年，數家著名巴斯公司捐了款。1910年，為悼念愛德華七世國王逝世，祇教會所還舉行了拜火教追悼儀式。⁽⁴⁶⁾

以上是巴斯客商對香港的生活和發展做出的部分顯著貢獻。

【註】

- (1) 有關賈姆謝德治·傑治皮爵士的傳記有好幾個版本，如B. K. 卡蘭賈的《隨時給我一個孟買商人！賈姆謝德治·傑治皮准男爵生平，1783-1859》，孟買大學出版社，1998年；C. S. 納齊爾的《第一位巴斯准男爵》、《熱罕吉爾·R. P. 賈姆謝德治·傑治皮：第一位印度騎士和准男爵》。
- (2) 湯瑪斯·L. 雷頓，《嬉鬧的航行：新英格蘭商人和鴉片貿易》，加利福尼亞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97-199。
- (3) 魯通治·阿德席爾·瓦迪亞，《婁治·瓦迪亞的子孫們》，孟買，1964年，頁110-112。
- (4) 愛德溫·格林·薩拉·金塞，《天堂銀行：印度招商銀行，1853-1893》，頁8。
- (5) (6) 毛里斯·柯林斯，《匯豐銀行》，費伯出版社，1965年，頁24；頁28。
- (7) 弗蘭克·H. H. 金，《匯豐銀行史》，第一卷，《中華帝國後期穩定的香港銀行，1864-1902》，劍橋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57。
- (8) 安妮·布雷，《孟買的遠洋船舶，1790-1833》，里士滿：柯曾出版社，2000年，頁196。
- (9) (10) 魯·阿·瓦迪亞，見前引書，頁97；頁112。
- (11) B. K. 卡蘭賈，見前引書，頁24。
- (12) 安妮·布雷，見前引書，頁200。
- (13) 參見克莉絲汀·多賓，《亞洲實業界的少數民族：創造世界經濟史的聯合社區，1570-1940》，里士滿：柯曾出版社，1996年，頁86-87。
- (14) (15) Koh Sung-jae，《亞洲工業發展的各階段：日本、印度、中國和朝鮮的棉紡業比較》，費城出版社，1966年，頁90-91；頁104。（Koh Sung-jae 疑為韓國人，查不到他的中文名。）
- (16) 克莉絲汀·多賓，見前引書，頁93。
- (17) 〈澤諾比亞·席羅夫·傑治皮·達達皮和孟買的工業化〉，見納瓦孜·B. 莫迪（編），《西印度的巴斯商人，1818-1920》，孟買：聯合出版社，1998年，頁146-147。
- (18) 維斯匹·S. 達斯圖爾，〈賈姆謝德治·傑治皮爵士：第一位准男爵，印度的偉大兒子〉，見納瓦孜·B. 莫迪（編），見前引書，頁117-118。
- (19) (20) (21) B. K. 卡蘭賈，見前引書，頁30-31；頁33；頁33-36。
- (22) 卡爾帕納·德塞，〈巴斯商人在19世紀孟買城市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見納瓦孜·B. 莫迪（編），見前引書，頁157-158。
- (23) (24) 魯·阿·瓦迪亞，見前引書，頁97；頁108。
- (25) B. K. 卡蘭賈，見前引書，頁48-50。
- (26) 魯·阿·瓦迪亞，見前引書，頁108。
- (27) 克莉絲汀·多賓，見前引書，頁21。
- (28) 維斯匹·S. 達斯圖爾，見前引書，頁115；B. K. 卡蘭賈，見前引書，頁48-49。
- (29) 卡爾帕納·德塞，〈三華和錦緞莎麗：巴斯人的紡織和刺繡品〉，見P. J. 哥德雷日、F. P. 密斯特里（編），《祇教徒的繡花掛毯：藝術宗教和文化》，馬品出版社，2002年，頁577-603。
- (30) 有關藝術和文化的資訊見網際網路。
- (31) 維斯匹·S. 達斯圖爾，見前引書，頁122-123；B. K. 卡蘭賈，見前引書，頁33。
- (32) (33) 索羅門·巴德，《香港的貿易商：一些外商的住宅，1841-1899》，香港：市政局，1993年，頁85；頁85-86。
- (34) 《一個老巴斯僑民講述香港巴斯商人的經商活動一百年》，見香港ZBW電臺為紀念香港巴斯商人從事經商活動一百週年而播放的廣播講演集，1941年由新世界新聞社出版，頁101。廣播講演由1941年1月18日至20日播出。以下簡稱《一百年》。
- (35) 柯林·N. 克里斯威爾，《大班：香港的商界王子》，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81年，頁185；索羅門·巴德，見前引書，頁88。
- (36) (37) (39) (43) 《100年》，見前引書，頁98-99；頁101-102。
- (38) (40) 索羅門·巴德，見前引書，頁88；柯林·N. 克里斯威爾，見前引書，頁185；頁89。
- (41) 柯林·N. 克里斯威爾，見前引書，頁184；《一百年》，見前引書，頁100。
- (42) (44) (45) (46) 施其樂，《歷史感：香港社會及城市史研究》，香港：香港教育出版公司，1995年，頁390-398；頁392；頁391；頁392。

郭頤頓譯